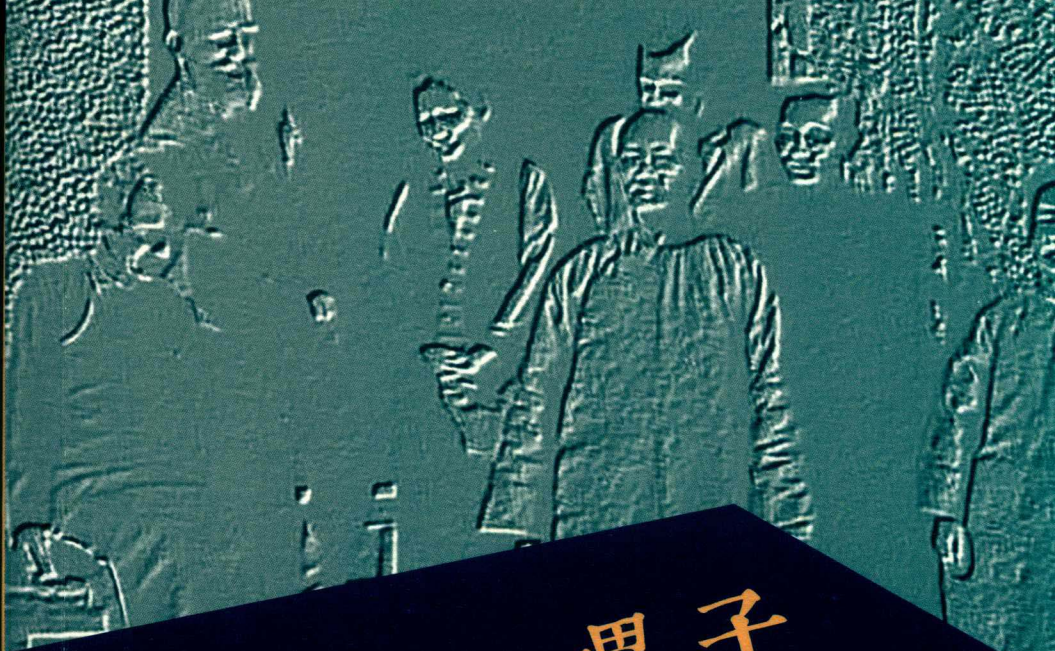




喧闹的骡子

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化

李兆忠 著



李兆忠 著



喧闹的骡子

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化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喧闹的骡子：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化 / 李兆忠著. — 修订本.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4
ISBN 978-7-108-06327-4

I. ①喧… II. ①李… III. ①留学教育—关系—文化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 G648.9 ② K27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1174 号

责任编辑 王海燕

装帧设计 刘 洋

责任校对 张 睿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2

字 数 254 千字 图 18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4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再版序言

在我的研究著述中，《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是自己最得意的一部，尽管它不如《暧昧的日本人》影响大，却是在《暧昧的日本人》的基础上诞生的。

读过《喧闹的骡子》的朋友多认为：此书的精华，主要在留日部分，相比之下，欧美部分显得单薄，“东风”盖过“西风”。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

我曾在日本住过四年，自信与日本有某种文化上的“宿缘”，留日期间就开始相关的研究写作。这一切，后来定格在《暧昧的日本人》一书中。有了这样的铺垫，再来书写《喧闹的骡子》（留日部分），便有举重若轻的感觉。可惜，我没有留学欧美的经历，缺少活生生的感性认识，只能凭借纸上所得，做知性的分析，尽管使出浑身解数，还是感到隔一层。

《喧闹的骡子》201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后，在学界引起反响，评论文章登载在《中华读书报》《读书》《文汇报读书周报》《时代阅读》《书屋》等报纸杂志上。有意思的是，《喧闹的骡子》中的个

案研究，受到学界同行的普遍称道，而序文中关于“骡子文化”的议论，却受到质疑。先有赵京华的《我观骡子文化》，后有董炳月的《多元的留学，多元的文化》。前者认为，“骡子文化”可以涵盖西方“现代性”发源地之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西方现代文明的普世性，造成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骡子文化”的普遍性，因此，没有必要为“骡子文化”担忧，进而指出：“在一百年来吸纳和迎拒西方现代性的激烈较量过程中，现代的思想观念、现代的制度文化乃至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已然成为内在于我们自身的东西，或者说‘现代’已经成了我们的肉身。”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很有道理，并且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但与事实并不完全符合，至少就中国而论，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确已为多数人接受，变成“自身的东西”，然而“现代的思想观念、现代的制度文化”，却远未被人们（尤其底层的民众和上层的官员）接受，他们的思想观念，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前现代”阶段。唯其如此，当代中国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硬实力”与“软实力”失衡，呈现矛盾冲突的状态。这种中国式的“骡子文化”特征，与东亚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的“骡子文化”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列宁同志早就说过：“比喻都是跛脚的。”董炳月的《多元的留学，多元的文化》抓住“骡子”比喻的漏洞，对“骡子文化”的“生殖”问题做了机智的阐发，对笔者“骡子文化”难以传承、杂交品种“代际退化”的看法进行了辩驳。在他看来，近代以降，中国的“骡子文化”展示了超强的生殖力，“一直在茁壮成长，在延续，在发扬光大”；进而指出：“李兆忠所谓‘遗传焦虑’并非‘是否能够遗传’的焦虑，而是‘遗传之后’的焦虑——即‘文化意义上的骡子’及其后代们在诞生之后面临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焦虑”，

可谓精当，与笔者“马骡”（西体）与“驴骡”（中体）相争不休的看法，正好不谋而合，不同在于，笔者有感于中国现代文化根绪断裂、狂悖暴走、主体性缺失的历史状况，看法比较悲观。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与学者高屋建瓴的理论阐发相比，普通读者对《喧闹的骡子》的视角和看法更加切合实际。在当当网上，笔者读到这样的评点：“此书快读完了，很值得阅读。这是作为去留学的参考读本开始的。‘学术’二字的形容对此书而言过于重了，此书更像随笔，风趣幽默的文字读起来趣味盎然，很容易就进入语境。作者具较深厚的人文功底和心理判断，中肯的批评中应该较真实地还原了光环下的一系列名人留学的历史。推荐给对百年前的历史感兴趣的人、对于人生价值和定位有探寻兴趣的人。文中最后结尾很耐人寻味，也非常沉重。历史和当下总是没有缝隙，想起来让人很纠结。”评判之中肯、精到、实在，令笔者惊异，欣喜之余，不禁要向这位素昧平生的评论者致以敬意！

《喧闹的骡子》初版以来，一晃七年过去，重读此书，新鲜感犹在，且平添一种历史的会心，令人欣慰，十年工夫没有白费。承蒙三联书店厚爱，得以再版，在此深表谢忱。同时也感谢责编王海燕女士为此书付出的心血。

还有，本书所引近现代诗文，以目前通行的版本为依据。出于对原作者的尊重，在用字用词上尽量保持原貌，特此说明。

李兆忠

2018年春

自序

翻开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面赫然写着两个字：留学。自从1847年容闳等三名学子随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东渡新大陆，首开中国人留学的纪录，这一百七十多年来，留学之潮由小变大，奔涌不息，其间尽管出现反复（如留美幼童中途撤回，“冷战”时期中国停止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总体上呈现着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中国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世界大串联”浪潮，至今方兴未艾。

从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中国文化思想现代转型的角度看，留学的意义与贡献，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胡适将留学比作摆渡西方文明的“舟楫”，将留学生比作“舵手”与“篙师”；季羨林将留学生比作“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现代化的报春花，都是可以成立的。举凡现代中国的一切，从物质文明到文化思想，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莘莘学子从国外引进的。据统计，1900年至1937年在日本院校注册的中国学生的人数为十三万六千人；1854年至1953年的一个世纪内，中国留美学生达两万一千人；另据1945年《联

大八年》的纪念册统计：西南联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中，留学生一百五十六名，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留学，便没有现代中国。

百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表面上看，是中国的社会政治外交危机激荡的结果，种子其实多年前早已布下，且与“留学”有直接的关联。其远因，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当时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惊破了中国人的千年迷梦，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制夷”之道，遂有后来的洋务运动及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留学生派遣；其近因，则主要由三件大事构成：以中国的惨败告终的1895年甲午战争，在宣告中日国际地位发生逆转的同时，也宣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破产、西方近代文化的胜利，第二年，清政府就向日本派出十三名留学生，以此为开端，留学的大门正式开启，有识之士纷纷东渡日本；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进一步摧毁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其情形正如孙中山先生说的那样：“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之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所以经过义和团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三民主义第五讲》，1924）在沿海地区的知识界，留学渐成一种风气；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提前废除，釜底抽薪，断绝了中国学子历来的安身立命之路，是年留日狂潮勃兴，五千中国留学生一下子涌到东京，第二年激增到一万三千。至此，出洋留学之潮，已是沛然莫之能御。客观地看，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学子想接受地道的现代教育，成就一番事业，出洋留学几乎是唯一的途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现代“新文化”已如开弓

之箭。此后十年，正是中国文化发生结构性变化，新学取代旧学的时期，日译的西方新概念、新名词，通过留日学子之手铺天盖地涌入中国；与之同时，留学欧美的中国学子也不断地给故国输入新文法、新学理、新思想，尤其是以胡适为首的一批留美学子，在大洋彼岸酝酿了一场文学革命，不仅在理论上为新文学鸣锣开道，也在操作层面上为新文学的诞生做了示范。至此，中国的现代新文化已是呼之欲出。

缅怀前贤的留学壮举，不由令人感慨万端。莘莘学子在异域度过宝贵的青春岁月，孜孜矻矻，遨游于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的海洋，含英咀华，为沉痾深重的祖国把脉，并为其设计未来。鲁迅和胡适，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留学时代写下的《摩罗诗力说》《非留学篇》，至今依然熠熠闪光。他们都具备文化圣人的气质，一个发誓“我以我血荐轩辕”，一个立志“他日为国人导师”。他们的救国方略都抓住了根本：一个主张“立人”，从精神入手，改造国民性，建设一个外不后于世界潮流，内不失固有血脉的新中国；一个主张“树人”，通过滴水穿石的教育，为未来“造新因”。他们的思想基石，在留学时代就已形成，回国之后，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旗手。确实，没有他们的呕心沥血，唤醒国人，开启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与世界及时地接轨，中国人的“球籍”恐怕真的不保。

然而，留学给我们带来的并非都是风和日丽的美景。纵观 20 世纪中国的文化景观，处处带有“半殖民地”的烙印，每一种流行的思潮背后，都有西方的依傍，什么中国的杜威、中国的歌德、中国的席勒、中国的卢骚、中国的左拉、中国的泰戈尔、中国的曼殊斐尔、中国的赫胥黎、中国的毕加索，不一而足，本土的文化圣祖，

不是被打翻在地，就是被彻底遗忘；同样，中国思想界、文坛上无休止的争论，多半是西方已有论争的翻版，中国学子们挥舞着从西方师父那儿舶来的利器，打得不可开交，偌大的中国知识界，成了西方思想的跑马场，各种思想、学说、主义在这里冲折较量，消耗着巨大的能量。在这种处境下，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标准与话语方式，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陷于被言说、被解释、被界定的可悲境地。这一切无疑都是留学带来的副产品。

追本溯源，留学本是西方强势文明在全世界扩张的结果，而落实到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超稳定”精神结构的农业文明古国，事情不能不变得格外尴尬。众所周知，中国人对留学的态度曾经历过一个一百八十度的逆转：从将异域西方视若蛮夷鬼域，无人愿往，到对它顶礼膜拜，趋之若鹜。这个极具戏剧性的逆转过程，反映了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经受过七十年的挫折和失败，中国人文化自信心失落，由“中体西用”向“全盘西化”倾斜，文化思想主权不得不拱手相让的严峻现实。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扭曲和伤害是无法估量的，造成了他们文化人格的分裂，精神定力的丧失。

更何况，“西方”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多元的存在，有英国式的，有法国式的，有俄国式的，还有日本式的。因此，如何西化，以哪一国为效仿的样板，便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从客观的结果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留学国的社会制度、政治模式和历史文化传统，对于年轻的中国学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所谓“留日派”“留俄派”“留欧派”“留美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当然，中国学子的家庭出身，固有的知识教养，乃至个人的性格气质，都潜在地制约着他们对异域文化的选择与认同，两者一

经契合，便产生各式的西方文化代理人，比如胡适之于美国，丁文江之于英国，瞿秋白之于俄国，周作人之于日本；单独地看，他们自成体系，无懈可击，合到一起，便不免扞格，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到后来，在客观的态势上，形成了以胡适为首的留欧/美派和以鲁迅、郭沫若为首的留日/俄派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在社会矛盾不断升级、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背景下，冲突博弈，形同水火；而暗中操纵这一切的，是代表着人类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俄、美超级大国。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是没有任何留学背景的毛泽东，这位自学成才的伟人一向瞧不起留学生，早在1920年给友人信中就这样写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毛泽东对其有更严厉的批判——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毛泽东对留学生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然而一面倒地否定，却有失公平。毛泽东固然没有留过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受留学的影响，他的思想，他的理论，包括他用的词汇（如上述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等）很大一部分都是留学生从国外引进的，经过他的天才头脑的整合，变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斗争哲学。广义地说，近代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留没留过学，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免受“留学”的影响。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是西风东渐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宿命，其是其非，都包含在其中。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传统的中国好比是驴，近代的西方好比是马，驴马杂交之后，产下现代中国这头骡；现代中国文化从此变成一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骡子文化”。根据生物杂交的一般原理，第一代的杂种兼具双方的优点，品种最佳，之后逐渐退化。这个生物学原理同样符合中国现代留学史的实况。第一代留学生里多出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文化巨人，如严复、陈寅恪、鲁迅、丁文江、胡适、郭沫若等，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化奠定了基础，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但随着时代变迁，岁月流逝，这种学贯中西、兼具马驴优点的“超级骡子”越来越少，他们的遗产也越来越难以为后人继承。然而仔细想一想，也只好释然：既然产生这种“超级骡子”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骡子文化”每况愈下也是情理中的事。到后来，“骡子”分成两大派：一派性近驴，姑且称“驴骡”，一派性近马，姑且称“马骡”；前者号称“寻根派”，后者号称“现代派”，他们争吵不息，经常上演“关公战秦琼”的大戏，表面上热闹，却少了祖先的眼光和气魄。“驴骡”个头小，势单力薄，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地位，由于血液里文化基因的作用，时时萌发返本的

冲动，弄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新古董，让辉煌的古典传统重新闪光一把；“马骡”个头高大，气宇轩昂，在现代的历史语境中一直占据优势，隔三岔五从西方师父那儿批发些新鲜玩意儿，各领风骚三五天，其语言是中式鸟语，深奥如天书，故只能在一个极小的行家圈子里通行。有意思的是，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国运昌盛，国粹行情日渐看涨，“马骡”们也纷纷鼓吹起中国传统文化来，用的却是他们的洋腔洋调。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应当承认，中国现代的“骡子文化”是一种不自然的、主体性欠缺的文化，它摇摆多变，缺乏定力，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刺激下每每陷于非理性的狂奔。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化语境至少经历了六次剧烈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作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命运，我们无法对此做简单的臧否，只能心怀忧思，静观其变。众所周知，现实中的骡子不能生殖，故而性情暴躁。那么文化学意义上的骡子又怎么样呢？这一百年来接连不断的喧哗、骚动与争斗，是否就是“骡子文化”遗传焦虑的一种表征呢？

二十几年前留日归来，在反刍四年异域生活，写《暧昧的日本人》的时候，萌生了研究留学生文学的念头。当时只觉得这个题目有趣而且重要，上手之后，才发现自己掉入一个陷阱。凭自己可怜的知识学养，要想说清楚这个涵盖古今中西的题目，简直太难了。起初真是无从措手，中间几次都想放弃。能够坚持下来，完全是出于职业道德的鞭策，那种艰难，犹如西绪弗斯推着巨石上山。由于不擅长理论思辨，只好采取最笨拙的办法：一遍又一遍地细读文本和相关历史文献，发现蛛丝马迹，摸着石头过河。惨淡经营十余年，弄出这么一个东西。本书解读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重量

级的“骡子”，试图通过对他们的异域留学生涯及其结果的阐述，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如果这本书有助于大家思考和理解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处境，并且做出积极的反应，我的力气就算没有白费。

李兆忠

目 录

再版序言 001

自序 005

孤独的摩罗诗人

——寻访「原鲁迅」 001

从东洋到西洋

——丁文江的留学生涯 015

「大中华」与「小日本」的恶性互动

——《留东外史》解读 031

设计中国现代文学

——胡适文学革命的异域文化背景

纵情的极限

——《凤凰涅槃》诞生始末 061

天堂中的地狱

——郁达夫的东瀛之怨 085

沉重的失态

——解读成仿吾 103

移根的代价与收获

——陶晶孙的世界 115

东亚启示录

——丰子恺与日本 138

想象的中华白马王子

——张闻天与他的《旅途》

173

错位的东方『康桥』

——徐志摩与日本

183

寂寞中的诞生

——老舍与英国

194

塞纳河上，是否风光依旧？

——傅雷的留学生涯及意义

211

早熟的世界公民

——巴金的异域题材写作

229

眼泪引发的笔墨官司

——徐志摩与郭沫若的一次碰撞

242

自卑与超越

——留学生写作中的『弱国子民』心态

255

东风与西风

——留日派与留欧、美派之争

282

『假洋鬼子』的沉浮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

306

孤独的摩罗诗人

——寻访『原鲁迅』



1918年，中国文坛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狂人日记》诞生。

这是鲁迅出手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艺术上却是如此的精粹，令人惊叹。它取法于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却以忧愤深广的意境和炉火纯青的现代汉语，青出于蓝；西方的神韵，中国的气派，两者水乳交融，无迹可求。

按照法国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之说，一座艺术高峰的周围，必有许多略低的次高峰簇拥，然而事情到了中国却有点例外，鲁迅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与其他的“第二”“第三”比起来，明显高出一大截。或许是上苍对中国的垂怜，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不出一个鲁迅这样的文学巨人，岂不太煞风景？

这一切当然不是空穴来风。鲁迅的特殊性在于：他艺术上的成功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结果，不像创造社诸公现炒现卖西方的新浪漫派，文名大振的同时，也留下许多遗憾；鲁迅是经过充分准备、漫长潜伏之后登上文坛的，丰沛的天才此时已磨砺得锋利无比，只等一声令下，便扬眉剑出鞘，摧枯拉朽，替中国的新文学开辟道路。